一

学 生 时 代

“闯世界”

1910年1月7日（宣统元年己酉12月17日），我出生在邕江畔上一个风景绮丽的村子——广西南宁市亭子村。

据家存的《莫氏族谱》载，我莫氏太祖文允公，其原籍为山东青州府寿光县白马驿，于大宋皇祐五年（公元1053年），随狄青“调戍而来”，落居邕江对岸“平南村四团白沙之阳”，即今亭子村。从祖上传至我祖父，已有17代。

我的祖父莫予双，号惟一，先开办怡和商店，后习武，中武举，任守备职，诰授“武德骑尉”。但他不入公门，不理团务，仍在家继续经商。

我的父亲莫廷俊，号煦堂，身材魁梧，不愧为武

人之后。但他却喜诗文，其书房称为“垂柳读书堂”，藏有很多线装古书。他的古诗文造诣较深，能诗能字，常邀文友咏诗对句，遗有诗抄集传家。本来父亲想考秀才，因祖父过早去世，家庭负担重，使他放弃功名的追求，只捐了个贡生，接替我祖父，从事经商。辛亥革命期间，父亲参加反清斗争，后又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，曾被选为广西省参议员。

我小时候家境还不错，家里有点田地，父亲在城里开了一个卖布的“苏杭铺”。后来，家里人口多了，日子越过越难，慢慢衰落了。到 1925 年，父亲做生意破产，布铺卖掉了，后来田地也卖掉了。 1943 年，日军第二次占领南宁前， 82 岁的父亲因家中无人照顾，衣食无着而饿死。大哥文驹也被日寇杀害。

我母亲黄婉卿，壮族，贫苦出身，是一位善良、勤劳、有志气的农村妇女。她出生在越南一个靠近广西的木马村， 14 岁时被人拐骗卖到我家。大娘死后，嫁给了父亲。在旧家庭中，母亲是买来的丫头，又当继室，自然没有地位。母亲先生了两个女孩，遭到家庭和族人的非议，很恼火，不知流了多少泪。以后她生了几个男孩，地位才逐渐提高。母亲一共生了 9个孩子，6 男 3 女，大娘生了 2 男 1 女。我在男孩中排行第六。

我 7 岁上村里的蒙馆，后到姓雷的一家私塾读

书。那时已兴新学（办洋学堂），入私塾比较土气，上洋学堂吃得开。我的几个哥哥都没有上过洋学堂。当我读了 4 年私塾之后，母亲支持我上洋学堂，、去外面读书，闯世界。可父亲并不打算送我进城上学，他觉得孩子能认识一些字，会写信就行了。父亲比较胆小守旧，总想把孩子拢在身边，生怕我们出去闯祸。为此，母亲与他吵得很厉害，她曾说，我生了几个男孩，要出去闯世界，总要闯出一个来，干一番事业，就是去当兵，也不怕。母亲的话，给我印象颇深。在家境衰落的情况下，让孩子出去闯一闯，这是她对改变困境的惟一冀盼，也是她对社会家庭命运的抗争。

经过母亲多次力争，我 14 岁那年，母亲带着我到城里考上了南宁市模范高等小学，成了家里第一个上洋学堂的人。从此，我学名为莫万，字六琴。

学校离我家有七八里路，中间隔着一条邕江。每天天一亮便起床，急忙吃碗稀饭，拿上父亲事先给准备好的 5 个铜板去上学。往返摆渡过江用去两个铜板，剩下 3 个铜板，中午在街摊上吃碗米粉充饥。早起晚归，每天上学还是很辛苦的。我知道家里供我上学不容易，故读书不敢偷懒，成绩也不错。 4 年高小，算是扎扎实实地读了 4 年书。我对英语比较爱好，学习上用功。后来，我住城里，晚上还参加校外的英文补习班。参加革命后，我也一直坚持学习英

语，时常读一些英文书籍和英文报刊。我喜爱运动，比较活跃，在学校里，短跑和跨栏常得第一名。对篮球也很喜欢，我被选为体育部长。

可能与父亲的影响有关，我还偏爱古文，对《古文观止》中的佳作名篇颇有兴趣，能把《岳阳楼记》、《陋室铭》、《醉翁亭记》等名篇背诵下来。

外出读书，使我增长了知识，开阔了眼界，也逐渐了解和认识了社会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家庭和社会上碰到的事情也开始有了思索，使我慢慢地懂得了一些“人情世故”了。其中有几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，印象尤深。

记得我家的邻居有一户姓雷的寡妇，她家有些田地，靠雇一长工来种。雷寡妇有个 16 岁的女儿，长得很漂亮，我喊她七姐。雷家雇的长工是个壮丁，很能干活。时间一长，这个长工和七姐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，事情被发现后，闯下了大祸！有一天晚上，姓雷的家族聚集了上百人，由族里的头人带领，把姑娘提到母猪湾，硬逼七姐跳河自杀了！而她的母亲就在现场，含泪看着对女儿的“处罚”。第二天我们兄弟才知道这件事，非常气愤，我心里便萌生了社会黑暗、宗法吃人的朦胧意识。

那时父亲的一个胞妹家很穷，父亲为了帮助他们，让姑家的表哥到布店来当伙计，以后又慢慢培养

表哥管账当师爷。后来，父亲为了让大哥文驹和表哥谋生自立，就分出一部分家产给他俩，每人一份股金，合开了一个“宏章”布店，生意还不错。可我大哥不争气，不到两年就把自己的股份花光了。这时表哥就一脚把他踢了出去，布店全归表哥占有了。由于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，父亲只好反过头来向表哥借钱，还要付利息。又过了几年，父亲做生意破产，把布店和房屋都转卖给表哥了。父亲贫困了，表哥也就不管他了。有一年除夕，我们兄弟 3 人（五兄文骢，七弟文骐和我）随父亲在市里过年，晚上我们做好了饭菜等父亲回来，可等到 7 点多钟还不见回来，我们非常着急。这时，表哥气呼呼地来找我父亲。我们知道他是来催债的，五兄非常生气，要打他，我说不要打，以免引起别的事来。等了一阵他就走了。直到 9 点多钟父亲才回来，他脸色阴沉，问我们表哥是否来过，并说他在外面躲债到现在才回家。除夕之夜，万家灯火，远近的爆竹声响成一片，我们却相对无语，默默地饮闷酒、吃年饭。真是世态炎凉，人情如纸啊！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痛苦的印记。

每年雨季邕江涨水，英国军舰开到南宁，这些横行霸道的英国水兵，是我最早看到的外国人。外国兵舰随便侵入我国内河来示威，这些印象同刚接触到的“列强”、“帝国主义”等新名词一起装进了我的脑海

中。那时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在南宁也很大，当地一斤麦才值几分钱，可进来的大麦片一罐竟值一块钱；一张牛皮几块钱，从香港进来的一个篮球要 10 多元。洋货侵入，土货破产。南宁不少人家织土布，我母亲也买了一架木质织布机，可家织土布比不上外来洋布，因而都蚀本破产。这使我初步意识到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，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。

随着“五四”运动的深入发展，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的新思想、新文化也不断传入南宁，在各校学生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激发我们进一步投入时代的斗争激流中去。

1923 年 10 月，北洋军阀曹锟在北京召开国会议员大会，会上，公开使用贿赂手段，获选为大总统，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强烈抨击和谴责，民怨沸腾，既谴责曹锟的贿赂枉法，也臭骂议员们受贿的卑鄙行径，称议员们为“猪仔”议员。

不久，广西出席国会议员大会参加贿选的议员雷颖川、唐仁阶、詹××等 3 人悄悄回到南宁，下榻于仓西门大街邕南旅馆。

邕南旅馆离我校较近，学校师生接到旅馆附近群众的报信后，进步教师赵秉寿和邓哲带领四五十个同学，于当天上午 10 时左右，扛着旗帜，敲锣打鼓，浩浩荡荡直奔邕南旅馆。我是其中一员。省立第三师

范等校的学生也闻讯列队前来参加，大家在旅馆门前，振臂高呼：“打倒猪仔议员！”“反对贿赂选举！”“打倒卖国贼曹锟！”街上的市民群众也前来围观，把旅馆围得水泄不通。

这时，大家愤怒到极点，破门冲入“猪仔”议员的住房，把他们拉出来示众，我也拼命挤上去，举起拳头，揍了他们一顿。最后，他们只好叩头乞求饶命，表示向民众认罪。大家出了一股怒气，便胜利收队回校。

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，虽然有些莽撞，但教训了害国枉法的坏蛋，心里感到很痛快。

加入“中学”

1925年，“五卅”惨案发生，我未考中学，参加了以进步学生为核心的南宁学生军，共有200多人，进行军事训练。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，抵制日货的斗争。开始，学生军得到广西军政当局的支持，派来教官。后来，旧军队插手学生军，想把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编到正规部队去当学生兵，我们纷纷退出学生军。

1926年春的一天，父亲上街回来说，出布告招中学生了，要我去考，这真是他的一个大转变。于是，我去应考，并考上了省立第一中学，分在第19

班。

当时，正值国共合作，大革命的洪流波澜壮阔。为了加强党对广西工农革命运动的领导， 1925 年冬，中共广东区委派中共党员陈勉恕到南宁开展建立党团组织活动，其公开身份是省立一中校长兼南宁（三民日报》编辑主任。接着，共青团广东区委先后派严敏、王克欧、谢蔚然等到南宁建立和发展共青团组织，还有中共党员周国杰、罗如川、夏意超和共青团员李省群等先后被派到我校任教。他们都以省立一中为据点，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及合法身份，大力传播革命思想，经常向我们青年学生介绍革命书刊，如（向导》、《新青年》等。我进入一中后开始阅读革命书刊和马列主义理论著作，它点燃了我心灵希望之光，令我激发、奋进。

不久，我被选为学校学生会工人委员，主要是负责对工人群众的宣传、发动工作。因当时我们对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，故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学生运动方面。

1926 年夏，省立一中一批经过大革命洪流锻炼的先进青年，首批加入共青团。在一中成立南宁第一个团支部，开始由何福谦任支书，不久，由梁砥接任。

梁砥是隆安县人，比我早一年考入一中，他加人

共青团后，见我平时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，便主动接近我，经常找我谈心，对我进行教育、培养。

1926 年 12 月的一天，我大胆地向他提出加入 CY （共青团）组织的申请。这时，他严肃地与我谈了三个问题：

第一，每个加入 CY 的人，要坚信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，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。这才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字相符合。

我听后联想到旧社会的黑暗，家庭的衰落，邻家雷七姐的惨死，以及帝国主义军舰在邕江的耀武扬威，便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我已认定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最美好、最理想的社会，我决心为这个崇高理想奋斗到底，直到牺牲自己的一切！”

第二，个人要服从组织，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定和纪律，严守组织的秘密。

对此问题，我也坚决表示说：“我一切听从组织的调遣，组织要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！”

第三，要艰苦奋斗，吃苦在先。因团组织的经费很困难，如被派外出工作，每月最多只能发给 20 元（广西小毫）钱的生活费，生活是很艰苦的。

梁砥一说完，我便毅然回答：“我从乡村来，什么苦都能吃，请组织放心！”

梁砥听了我对以上这三个问题的回答，满意地点

着头，表示接受我的申请，并担任我的入团介绍人。

过了几天，梁砥拿来一份入团申请表给我，填完后，便带我到北门街马武烈祠后楼，共青团南宁地委的秘密机关，团地委代理书记王克欧同我谈话。

经团地委批准，我便正式加入了“中学”（当时称共青团为“中学”，称共产党为“大学”）。与我同时入团的有王文栻、区耀模等。这时，全校的团员已有七八个人。

我入团后，更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。我们几位团员，经常到洋关东面的商埠公园的湖上，边划船边汇报、研究工作。我校团支部已成为当时南宁革命斗争的一个主要阵地和坚强堡垒。

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帮助下，广西已于 1926 年 1 月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。但随着工农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，以黄绍竑为首的广西国民党右派集团，对工农运动既害怕又仇视，千方百计进行造谣、破坏、镇压。

他们派桂军“进剿”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自卫军，杀害农运骨干和群众 700 多人，制造了震惊省内外的“东兰农民惨案”和“梧州三工人血案”。

面对这一股逆流，南宁的党团组织决定给予坚决反击，于是，发动广大群众，掀起了一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激烈斗争。

1927 年 3 月 29 日，南宁各界近万名群众在体育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大会，我们省立一中、省立三师、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、广西军校和南宁工人纠察队及工人群众等都前往参加。会前，我们作了准备，若右派镇压到会群众，工人纠察队和军校、农讲所学员便以武力反击。

大会在紧张的气氛中结束。因右派看到我们事先做好准备，故没敢在会场发难。

会后，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。我们一中的队伍走在前面。大家高举红旗，唱着《国际歌》和《打倒军阀歌》，高呼口号，昂首阔步地向市区前进。

当看见我们 200 多人的队伍高呼着革命口号经过广西课吏馆门口时，国民党右派分子、省党部宣传部长黄华表唆使几十个气势汹汹的人冲出来，有的手持利刀长矛，有的挥舞着“士的枪”，挡住我校队伍的去路，并破口大骂。顿时激怒了我们。我们虽然个子比他们小，手无寸铁，但毫不示弱。开始是对骂，后发展到对打。有的同学被刺伤，鲜血直流。我们没有退缩，坚决与他们搏斗。

这时，农民运动讲习所 100 名学员闻讯带着武器赶来支援，课吏馆的人见势头不对，立即溜回馆里，关起大门不敢出来。大家愤慨地在其门口高呼一阵口号后，便整理队伍撤回。

我们回到学校时已是中午 1 时许，这时，我才感到饥饿和疲劳。因喊口号多，喉咙也沙哑了。

打这以后，学校组织了学生军约 50 人，由梁砥任队长，我任排长，每人出钱 5 元，制军服，进行训练，负责会场维持秩序等工作。

1927 年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公开叛变革命。

以李宗仁、黄绍竑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，也以南宁为重点，开始在广西大举“清党”反共。一时，法西斯白色恐怖，笼罩邕城。

4 月 13 日凌晨，大批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包围了省立一中、省立三师、广西军校、广西农讲所、市总工会等单位，逮捕了罗如川、何福谦、梁砥等 90 多位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。这是南宁有史以来的一次最大规模的逮捕“政治犯”，也是最黑暗的一天。

我校团组织几位领导人都被捕了，我们听到此消息后，心里很着急，又得不到组织的指示，不知怎么办。

同月中旬的一天上午，我校未被捕的共青团员区耀模、王文栻、雷浩云、陈锡镇，还有进步青年杨赐璋等，来到亭子村我家碰头，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处境，感到白色恐怖下，随时都有被捕的危

险，开展工作就更加困难了。有的主张暂到乡下躲避一下；有的主张不能示弱，若一离开学校，反而暴露自己。最后商定：第一，坚持斗争，设法找到党团组织，听取指示；第二，继续回校上学，保护自己，不露马脚；第三，尽力稳住同学情绪，抓住有利时机，揭露反动派逮捕无辜学生的罪行；第四，若被捕，严守秘密，永不叛变。

大家商议后，又继续上学。

5月 4 日凌晨，天色黑魆魆。我和同学们正在酣睡中，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原来是反动军警持枪闯进学校，按照名单抓人了！

我被押到校门口传达室，看到同时被捕的有：训育主任卢宝贤、共青团员区耀模、王文栻、先进青年杨赐璋。我们 5 个人被五花大绑，押解出校门，沿着凸凹不平的街道，穿过仓西门大街，来到设在东辕门镇台衙门内的国民党 15 军军部拘留所。

阴森森的 15 军军部拘留所，共有 3 间牢房，呈品字形。

我们被押进拘留所时，见那里也刚押来十几个青年。相互见面后，都以惊奇的态度问长问短。虽然素不相识，但共同的处境使我们变得十分亲热。经了解，原来他们也是同天凌晨被抓来的。大部分是广西军校的学员。

在阴暗、肮脏的囚牢里，每天早上 6 时起床，接着放风。因一天只有一次放风，故大家都抓紧时间洗脸、上厕所。接着，便站着吃早饭，饭后又立即被关起来。午饭、晚饭也如此，晚上 8 时熄灯，整天见不到太阳。

牢中的伙食卫生条件很恶劣，吃的是残羹剩饭，既冷又脏，常见到有死苍蝇，令人作呕。蚊虫叮咬，夜不安眠，难友们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。

暑天到来了，牢房里像蒸笼一样闷热，恰南宁流行霍乱，牢房如此不卫生，难友们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，在军校难友的倡议和秘密发动下，牢房举行了一次绝食斗争。由于大家团结一致，迫使监狱不得不改善伙食卫生条件，绝食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。

同年 9 月 1 日，敌人开始下毒手了。那天下午，南宁上空阴云沉沉，城郊北门外刑场响起一阵枪声，有 13 位无辜青年，被敌人杀害了！他们是：罗如川、雷沛涛、张胆、莫大、邓哲、梁砥、冯荫西、高孤雁、梁六度、雷天壮、陈立亚、梁西园、周仲武。就义前，大家非常英勇、坚强，神态自若，视死如归，在沿途和刑场上高唱《国际歌》，有的嘴被敌人用布塞住，有的嘴巴被打得鲜血直流，但仍拼出全身力气，高呼口号不止，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大义凛然的崇高气节。

10 月 7 日下午，敌人又下毒手了。杀害了李仁及、张铮、周飞宇、秦霭云、何福谦、周国杰、卢宝贤、邓匡、阮锦、刘汉武、林汉泉、归醒南、莫品佳等 15 名同志。

眼看一批批难友无辜被杀害，我们心里燃起万丈怒火。当天开晚饭时，难友见面时都默不作声，心里像铅一样沉重。

第二天，我母亲听到南宁第二次杀人的消息，又听说杀人布告中有一个姓莫的，她的心情非常紧张，泪流满面。全家人也都落了泪。母亲先找附近淡村的巫婆问卜，然后带着我一套较新的衣服，自己一个人赶到刑场，准备给我收尸。到了刑场，烈士的尸体尚未收殓，但个个血污满脸，很难辨认。母亲既急于找到我的尸体，又怕真的见到我的尸体。她细心地挨个查看后，才透出一口大气，回家了。

10 月下旬，我们在拘留所剩下的难友，被转押到军部监狱里。一进狱门，一股腥臭气味扑来，令人作呕。狱内还关有其他犯人，其中有几个女犯，她们蓬头垢面，衣服破烂发臭。我受到这股腥臭气味的强烈刺激，恶心头昏，开晚饭时，一粒饭也咽不下去。晚上，躺在地铺上，昏昏沉沉好像患了一场大病。

由于没有太阳晒，地上潮湿，又没有放风，狱中所有的人都生了疥疮。全身长出小脓包，一个疥疮一

包脓。不管是小脓包或是湿疥，都很痒，越痒越抓，抓得伤口出血。狱中供水，每天一次，每人只分到半盆，早上洗过脸的水，要留到下午、晚间再用。

吃的仍是残羹剩饭，一般要到中午才开早饭。

肮脏、饥饿，使同志们受尽了折磨。难友们患病，敌人是不管的，也不准从外边请医生看病，就是要让这些难友被疾病折磨而死。不久，敌人组织一个特别法庭，处理狱中政治犯。我想，我们第二批被捕的难友，除罗少彦夫妇外，都是参加公开活动而被捕的，敌人抓不到什么证据。

大约是 12 月中旬，狱吏通知我到军事特别法庭候审。临近春节时，拘留所允许家人探监了。我母亲闻讯，便带着弟弟文骐和食物来看我。我们隔着栏杆，相距一米多远，总算母子、兄弟见面了。母亲见我的身体瘦弱，脸色苍白，涕泪交流，非常难过。我反复安慰她，并询问了家里情况。

又过了几天，我才被押到法庭“审讯”。只见那里坐着 3 个戴方帽，穿黑长袍的审判官，似阎罗王一样，旁边还坐着一个记录员。坐中间那个审判官问我的姓名、籍贯、年龄、读书学校等问题后，问：

“你是共青团员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我装着很天真，毫无惧色。

“你在一中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，调皮捣蛋？”那法

官又问。

“没有这回事，我的操行是甲等，不信，你们看看我的成绩单！”我反驳后，便把事前家人送给我的成绩单递给法官。

法官看后，不再问我，叫卫士押我回拘留所。同房难友认为法官问我的问题较简单，估计他们没有掌握什么证据。几天后，我又被押到法庭“审讯”。开始，仍由那个坐在中间的法官问我的姓名、籍贯、年龄、读书学校等问题。接着，他有气无力地宣布我“无罪释放”，并说：“回去要好好读书，不要再参加闹事！”

1928 年 2 月初我被“无罪释放”。

出狱后，我在家养病，恢复身体， 10 个月的非人生活使我的健康受到摧残，可我感到铁窗又可磨炼人的意志，在生死面前考验着革命者的忠诚和坚贞。我觉得自己更成熟了。

到了 6 月，我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，父亲筹措了几十元旅费和学费，我便到广州廉伯中学夏令班补习高中课程，准备报考大学。在那里遇到了未赶上考黄埔军校的五兄文骢。出发前，大哥文驹、三哥文骥给我改名为“文骅”，后因旧病复发，家里又没钱接济，遂又返邕养病。

回到家里，我设法找组织联系，但没有找到，这